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研
究
丛
书

《史记》

与中国史学传统

SHIJI YU ZHONGGUO SHIXUE CHUANTONG

张桂萍
◆ 著

 重庆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史记》

张桂萍 ◆ 著

SHIJI YU ZHONGGUO SHIXUE CHUANTONG

与中国史学传统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与中国史学传统/张桂萍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12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刘明华主编)

ISBN 7-5366-6895-3

I. 史... II. 张... III. 史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K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7424 号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史记》与中国史学传统

张桂萍 著

责任编辑 周英斌

封面设计 蒋忠智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字数 226 千 插页 3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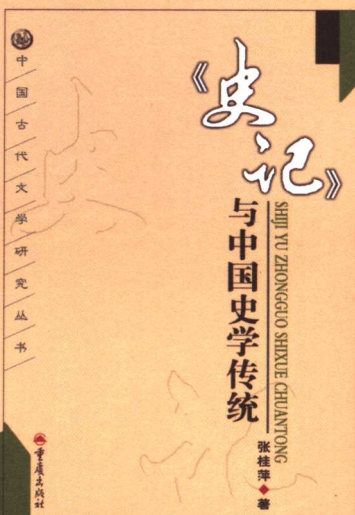
印数 1-3000

ISBN 7-5366-6895-3 / K·379

定价:21.50 元



张桂萍，女，汉族，1973年11月出生于新疆库尔勒市，祖籍河南南阳方城。1996年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1999年以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先秦两汉文学方向研究生毕业于该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先秦两汉文学的博士研究生，2002年7月获文学博士学位。2002年6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开始从事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兼及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已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责任编辑:周英斌
封面设计:蒋忠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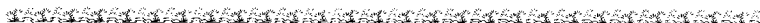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莫砺锋 钟振振

主编：刘明华

编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何宗美	黄大宏	熊宪光
胥洪泉	袁济喜	周英斌



内 容 提 要

本书在作者博士后出站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从实录传统、良史思想传统、“成一家之言”、因人叙事、史表传统、史论传统、民族史撰述传统、审美表述等8个方面总结了《史记》对我国史学发展的奠基性影响，并从这8条线索入手，清理了各个时期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在此基础上，本书总结了史学名著与史学传统、史学传统与古今史学、《史记》评论与史学批评等方面的规律，这对于发掘史学的民族风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关学者认为，本书选题具有鲜明的总结性和开创性，论证方法与所论问题都具有开拓性和学术价值，有不少精当的见解，深化了学术界对《史记》之价值的认识，促进了人们对中国史学传统之形成与发展的深入理解，在史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总 序

刘明华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重庆市重点学科。本学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师资队伍还是教学、科研方面，都是一支影响颇大的重要力量。

本学科从 1982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魏兴南、曹慕樊、林昭德、徐永年、郑思虞、李景白、谭优学、荀运昌、秦效侃、熊宪光、徐洪火、刘明华等教授至今已培养出百余名硕士，其中有 30 余人考取兄弟院校的博士生。他们大多已成为高校的教授、副教授或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如戴建业、巩本栋、陶新民、张瑞君、张立伟、韩云波、王明建、何宗美等，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成为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本学科在学科方向、研究领域内，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老一辈学者中，谭优学先生的唐代诗人行年考，曹慕樊先生的杜甫、苏轼研究，李景白先生的孟浩然研究，徐永年先生的唐诗研究等，都具有突出的学术地位和声誉。由此而形成了本学科在以杜甫研究为重点的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传统。魏兴南、



熊宪光教授在《史记》、《战国策》和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先秦散文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传统和优势。而年轻一辈的学者们,在叙事学的研究方面,已展现出强劲的势头。本辑出版的几部著作中,就有以现代小说理论为基础,对中国古代小说及小说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研究方向的拓展,本学科的成员在文人结社、流民文学、文体研究、学术史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等方面也有相关成果,已经或即将陆续发表。与此相关,本学科成员目前承担的各级各类重要项目,有力地支持着这些研究的深入开展。

近年来,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本学科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是一批富有锐气的博士加盟本学科,为学科发展增添了活力。除了已经出版的著作和陆续出版的丛书,本学科同志近年还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史》、《文献》、《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本学科在本科教学中素有优势,并不断继承传统,有所发扬光大。在教学成果方面,已数次获得学校和省市的优秀成果奖。2004年,本学科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下,申报获准“中国古代文学”为校级和重庆市的“精品课程”,并推荐教育部备选国家级精品课程。这正是对本学科几十年教学科研工作综合成就的肯定。

一个单位,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有一个持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既不能中断,也无法飞跃。学术不能搞大跃进,学术工作无法春耕秋收。学术活动是一代



又一代有志于学的学人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个人的学术生命在学科的发展中得到延续。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精神,学术之花才能结出富有学术含量的硕果。学术工作是艰难的,学术研究也是快乐的。——正是上面这些共识,使得这一个群体薪火传承,多年坚守在古代文学的领地,耕耘着辛勤,收获着快乐。

本丛书的出版,只是本学科几十年学术发展中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活动而已。既不是开端,更不是终结。可称得上是近年科研工作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其中,部分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这套丛书的第二辑、第三辑,将陆续推出。为展示本学科的传统,老一辈学者未刊的重要成果,也将陆续整理出版。

近年来,本学科积极加强与学术界的联系,在学校和文学院的支持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等重要学术会议。作为重庆市的重点学科,还负责重庆市古代文学学会的日常工作。这些工作对学科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学科长期得到学术界的前辈、师友和同好的支持。希望,也相信这样的支持会继续,因为我们对学术都怀有敬意和热情。

谢谢学校和重庆出版社对丛书出版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回报社会和学术的一个最好形式。

序 言

桂萍博士撰写的《〈史记〉与中国史学传统》一书就要出版了,我为此感到很高兴。我也欣然答应她的要求,为本书的出版写几句话。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遗产和优良的传统,这是中国史学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这在世界史学上是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独有的。

中国史学因有悠久的历史,故其优良传统的产生和发展也有久远的历史;中国史学因有丰富的遗产,故优良传统也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又因中国史学有层出不穷的史家,而历代史家多具有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自觉意识,故这些优良传统能够不断地得到阐释和运用,至今仍保持着勃勃生机,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在中国史学发展上,有许多史书对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例如《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史通》、《文史通义》、《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司马迁《史记》奠定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广



阔而深厚的基础,但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时时称道《春秋》,表明他是继承了《春秋》的传统;班彪、班固父子继承发展了司马迁的事业,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人们谈论得很多的话题;刘知几的《史通》一书,其《六家》、《二体》、《直书》、《曲笔》等名篇都是对史学传统的总结和发挥;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其《书教》、《申郑》、《释通》、《史德》等篇都突出地论述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总结前人的论述,概括了“史家四长”的传统等等。可见,中国史家对于史学传统是多么的重视。

这里,我想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历代史书中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春秋》和《史记》。而《春秋》的影响主要反映在思想方面,《史记》的影响则不仅仅在思想方面,可以说涉及到史学的所有领域,故其影响实际上超过了《春秋》。20世纪以来,史学界的朋友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史学传统的研究心得,也发表了许多研究《史记》的论著,其中有的也涉及到它和史学传统的关系,但总的说来,把《史记》和中国史学传统联系起来做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尚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桂萍博士的《〈史记〉与中国史学传统》一书可以说是开创性的著作。

桂萍博士生长在新疆一个偏僻的农村,后就读于新疆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2002年春夏之交,我接到了桂萍博士申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的申请。开始,我实在有些犹豫:因为文学博士在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中,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能做怎样的研究呢?后来,



我与桂萍博士有一次面谈,她的朴实和勇气,以及她对《诗经》、《左传》、《史记》等文献都比较熟悉,且有很不错的研究功底,于是,我就联想到多年来所考虑的“《史记》与中国史学传统”的问题,就用试探的口气问她,是否可以此作为博士后研究的课题。桂萍博士表示了肯定的意见,就这样,她于2002年7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开始她的新的研究工作。两年中,她凭借着自己的勤奋、执著和谦虚,顽强地在新的研究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终于写出了《〈史记〉与中国史学传统》一书。

《〈史记〉与中国史学传统》一书,不论对《史记》研究来说,还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研究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成果,给人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路径。对桂萍博士来说,可以看做是她从文学领域走向史学领域一个初步的、成功的尝试。这些,都是令人高兴的。

当然,《史记》与中国史学传统问题是中国史学上一个重要问题,不是一两部著作就可以论述得全面、深刻的。我希望在桂萍博士的这本书出版之后能够引起史学界朋友更多的关注,能够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研究成果问世。

是为序。

瞿林东

2004年11月20日序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自序

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于2002年6月27日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合作导师是瞿林东先生。入站之初,瞿先生在了解了我的具体情况后,给我提出了本书的这一个研究题目。由于我的博士论文也是有关《史记》的,多年来我也一直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动态,掌握了一些资料,阅读了一些史学方面的著作,我想做这样一个研究课题还是切实可行的。然而,接下来的两年研究工作,并不像自己预想的那样顺利,再加上我秉性愚钝,可以说我是在瞿老师的不断督促和鼓励下才如期完成了出站报告。在这两年当中,我从瞿老师和史学所其他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们在学术观点、治学方法、治学态度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上,对我有深刻的启迪和影响。在报告开题和出站评审会上,施丁先生、张传玺先生、林甘泉先生、吴怀祺先生、陈其泰先生都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这对我后来的修改工作有很大的



帮助,但限于自己的能力,有些问题暂时无法解决,只有待日后补足了。在人的一生中两年时间是短暂的,而对我来说,这两年对我的影响是长久的。

在我自己看来,出站报告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后续。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士期间,我的导师褚斌杰先生对我的学位论文也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希望我能继续做下去,我也想把自己的学位论文修改得更好,争取早日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出站报告却先出版了,权且算做交给各位老师的一份作业吧,希望能够继续得到他们的指导。

这里,我把本书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概括如下,以便于读者阅读和批评。

本文包含绪论、正文八章和结语。

开篇是绪论。这是关于传统和史学传统的认识,以及司马迁和《史记》与中国史学传统形成、发展的关系,其主旨在于把史学传统同《史记》结合起来,揭示二者的关系,考察史学传统发展的源与流,把《史记》不仅仅放在西汉史学中加以评价,而且把它放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加以评价。本文重点是从《史记》的影响及历代史家对《史记》的评论入手,注意考察司马迁和《史记》在思想和理论上对史学传统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第一章,《史记》与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史记》在汉代被誉为“实录”之后,历代史家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史记》的实录特征。在此过程中,“实录”的内涵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使实录成为史家在史料运用、历史评价和文字表述等方面最基本的标准,也使史家思



想和学风中溶入了实录精神。许多优秀的历史撰述成果由此诞生，从而使实录精神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前进。

第二章，司马迁与中国史学的良史思想传统。司马迁在汉代被人们称为“良史之才”，在后人对司马迁“良史之才”的论述中形成了一些评述良史的思想，如才识兼备、会通古今、经世致用等。后人尊崇司马迁为良史，这些思想也就深入人心，逐渐丰富了、形成了中国史家的良史思想传统。这是中国史学上极可宝贵的思想遗产，对当今史学工作者提高自身素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章，司马迁与“成一家之言”的史学传统。司马迁明确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宗旨，但后来史家对它的认识纷繁不一，没有发展成自成体系的史学宗旨论。本章通过总结古代、近现代史家对“成一家之言”的论述，认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反映了史学思想上的创新精神和自觉精神。其特征是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鲜明的著述宗旨、立言不朽的著述意识和会通古今自成体系的创新意识。“成一家之言”不仅是史家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目标，还有广泛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对中国古代修史制度理论、史家评价标准的理论及史家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中国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

第四章，《史记》因人叙事与史书传记的编撰传统。司马迁创立的“以人中心”的撰史方法，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念体现在历史编纂方法上，就是《史记》多用类聚同一性质人物、表



现社会层面的方法处理史料和撰写历史人物传。《史记》中的类传集中体现了司马迁分类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方法。后来史书在类传上所显示的活力,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社会历史观念和编纂方法对史家的影响。

第五章,《史记》的史表传统与清人的史表研究。史表作为史学著作体例之一被确立下来,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后代史家不断追踪司马迁,制作史表或研究史表,使史表的内涵和功能有了多方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运用史表、研读史表的传统,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关于史表编纂和应用的理论。这一点在清代史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读表、研表和作表用力之勤为前代史家所少见,说明史表在清代已臻于成熟。清人关于史表制作经验和运用理论的总结,对今天的史书编撰仍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六章,“太史公曰”与史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史论是指史家对于自己或他人记述的历史所发表的评论,是史家表达历史见解的主要形式之一。史家对史论的重视,在历史撰述和历史评论中都有突出反映。后来史家对“太史公曰”的评价涉及了史论内容、史论作用、史论标准和史论艺术等各个方面,并形成了相关理论,对中国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都有重大影响。

第七章,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与中国史学民族史撰述传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24部正史列传中,民族史撰述可以说是最有连续性的记述,因此,民族史撰述传统也成为最具有中国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的传统。而这个传统的开创者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尤其是司马迁表现在《史记》中的丰富